从“天人合一”到“命运共同体” ——探究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思想的发展与实践历程

张子杰

(华东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1589938150@qq.com)

摘 要: 本文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思想的发展脉络, 探讨了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演变与实践历程。从毛泽东时期的植树造林、防治水旱灾害、环境卫生治理等初步生态思想, 到邓小平时期的强调现代化建设与环境保护相结合, 再到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提出可持续发展理念及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 最后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 本文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如何通过不断实践, 逐步完善生态文明理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 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 并借鉴西方生态文明理论, 提出了“命运共同体”理念,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战略。文章强调生态文明思想对实现绿色发展、美丽中国建设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生态文明; 绿色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

从 1949 年 10 月 1 日新中国成立到现在, 已经有整整 75 年了。在这 75 年当中, 仅就比较明显的社会发展阶段来看, 大致经历了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时期、江泽民和胡锦涛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习近平领导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等四个特点鲜明的历史阶段和发展时期。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进程与美丽中国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是对党的百年历程中积淀传承的生态保护初心与在实践中逐渐清晰的绿色发展使命规律性深度把握的集中体现。在当前全球生态危机与经济复苏困难的背景下, 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 深入探讨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共产党在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方面的初心与使命的历史轨迹及经验, 能够为深刻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供逻辑和理论依据。这一思想不仅是理论指引, 也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的生态文明思想

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中, 逐步发展出一套内容丰富且具有独特表达形式的生态文明思想。他的生态观不仅关注人与自然的的关系, 还涵盖了人们日常生活与消费之间的平衡。他将生态思想从生产领域扩展到文化艺术与社会政治生活中, 在人口再生产、人的能动性发挥乃至妇女解放等人口与社会生态等多方面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 是新中国最早具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领导人。虽然囿于历史局限, 毛泽东的生态文明思想主要集中在经济生产和社会建设上, 但他为解决农业社会发展中遇到的突出问题, 留下了许多关涉生态文明建设的真知灼见成为我们今天发展完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来源。

建国后毛泽东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内容可以简要概括为三个方面的内容, 植树造林、水旱灾的防治、卫生环境的整治。

毛泽东一直对大自然怀有深厚的热爱, 并且始终强调林业保护在生态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他将森林资源的保护视为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部分, 并在多次讲话和政策中明确指出, 森林不仅仅是一个自然资源, 更是支撑农业和工业生产的基础。毛泽东认为, 森林的健康与繁荣直接影响到农业的产量和土地的肥沃程度, 同时也对水土保持、气候调节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他的治国理念中, 生态平衡与社会建设紧密相连, 保护森林资源便是确保社会经济长期发展的核心策略之一, 并多次强调森林资源是社会主义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积极进行林业的恢复与保护工作。1955 年,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讲到: “南北各地在

多少年内，我们能够看到绿化就好，这件事情对农业，对工业，对各方面都有利”[1]。毛泽东的生态思想表现出对自然和人类生活紧密联系的深刻理解，他坚信，只有保护好森林资源，才能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一理念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林业政策，也为后来的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国是一个水资源相对丰富的国家，黄河和长江不仅是国家的重要水系，更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孕育了辉煌的文化历史。然而，由于历史原因，许多河流长期未得到有效治理，水患频发，严重威胁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改变这一困境，毛泽东明确指出，水利建设与水灾治理是确保农业生产增长的关键所在。毛泽东深刻认识到水利工程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在建国初期，他亲自指导并推动了淮河、黄河、长江等重要水利枢纽的建设，这为我国彻底解决水旱灾害问题奠定了基础，也标志着我国水利建设的开端。

1950年，淮河流域发生了严重的水灾，形势异常严峻，出现了“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恶性循环。淮河水患泛滥，洪水肆虐，造成了“陆地行舟”的极端景象。与此同时，干旱也随之而来，“井泉枯竭，田无麦禾，野无青草”，严重影响了人民的生计。淮河两岸的百姓忍受着极度的苦难，生活条件异常艰苦，灾民甚至出现相互饥饿的悲惨局面。毛泽东高度关注这一情况，深知水利治理的紧迫性，亲自部署，推动一系列大规模水利项目，以缓解和解决这一历史性难题，就治理淮河水灾及时作出指示：“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8月份务须作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开始动工。”[2]治理水灾和兴修水利的理念是毛泽东生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导了新中国水利建设的发展方向，同时为我国当代水利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面临着极其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毛泽东在此背景下，带领全国人民展开了大规模的环境卫生整治工作，着力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和生存环境。毛泽东深知卫生和生态环境对人民健康的重要性，因此，他始终关注并推动一系列旨在提高卫生水平的措施。1955年12月，在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中，要求“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若干种危害人民和牲畜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血丝虫病、鼠疫、脑炎、牛瘟、猪瘟等”[3]。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指出：“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今年要每月检查一次，以便打下基础。各地可以根据当地的情况，增加四害以外的其他内容。”[4]虽然初期由于对生态了解不深，将麻雀列为害鸟之一，后来通过调查研究，发现麻雀不仅吃粮食，还能帮助控制害虫，对生态平衡有益。因此，毛泽东及时调整了“四害”名单，去除麻雀，加入了臭虫。这些举措，不仅改善了当时极其恶劣的卫生环境，还为中国后续的公共卫生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无论是消除传染病的传播，还是推动环境卫生的全面改善，这些政策和实践为新中国的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持，也为后来的健康事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毛泽东生态文明思想不仅是生产生态观，还涵括了消费生态观，渗透到社会生活各方面，形成了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以我国实际情况为基本出发点，以文化生态观统筹协调发展全局的世界观方法论指导。

2 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的生态环境保护思想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提出了许多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理念，并形成了系统的环境保护思想。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同时，邓小平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强调现代化建设必须与生态环境相协调。他特别指出，农业生产应当尊重自然规律，避免与生态环境产生冲突，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逐步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然而，部分地区在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忽视了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为了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与生态环境发展相平衡，邓小平强调现代化发展必须依据中国的国情和生态特点。他在分析中国的特点时指出：“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到的：一个是底子薄；第二是人口多，耕地少。”就第二个特点来说，“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5]。邓小平提倡，在推动国民经济全面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特别是要重视农业用地的保护，以确保农业健康发展，并维护生态环境的稳定，进而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农业一直是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在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仍然将其作为重点关注的领域。然而，过去的农业生产方式已经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求，尤其是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城乡差距的拉大，传统的农业模式面临着严峻挑战。邓小平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他强调农业发展必须尊重自然条件，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来发展农业生产。他指出，对于那些不适宜大规模种植粮食的地区，可以发展特色农业，而不是盲目追求粮食生产的单一目标。例如，在中国西北部分地区，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传统的粮食种植并不适宜，邓小平提出这些地区应该更加注重畜牧业的发展，以适应当地的生态环境和资源条件。这一观点反映了邓小平对农业与

自然环境协调发展的深刻理解。由于政策的导向，一些地区采取了大规模开垦草原和湖泊湿地的方式，试图通过扩大耕地面积来增加粮食产量，但这种做法却忽视了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破坏。尤其是“围湖造田”，表面上看，粮食耕种面积的迅速扩大似乎能带来短期的增产。然而，这种做法往往破坏了湖泊周围的生态环境，影响了湖泊的自然功能，如防洪、灌溉、蓄水等。1983 年 2 月，邓小平在游览太湖时了解到，十年动乱期间无锡在太湖“围湖造田”，影响生态平衡，他特别指示，过度开荒往往会导致土地沙化，进而导致水土流失要注意保护好太湖[6]。破坏土地原有的生态。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时期便意识到过度开荒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性，倡导并鼓励多植树，利用科学技术提高粮食产量而不是过度依赖扩大耕种面积。因此，邓小平提出，发展农业不能仅仅依靠扩大耕地面积，必须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而不是依赖破坏性的大规模开荒。他倡导在农业发展过程中要加强生态保护，多植树、保护水源，并且鼓励在适宜的地方发展特色农业和畜牧业，以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双赢。通过这些措施，邓小平为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并为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些观点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也为后来中国的农业政策和生态保护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思路。

邓小平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强调必须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来有效保护生态环境。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其资源的平均分配远未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因此，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巨大的资源和环境压力。在这一背景下，邓小平提出，必须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考虑到环境保护的需求，避免走“污染后再治理”的老路。他强调要采取“预防为主”的方针，从源头上减少污染和资源浪费，防止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具体来说，邓小平认为，只有通过依靠科技创新，推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才能确保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不会因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而付出沉重代价。

邓小平的环境保护思想内容丰富、内涵深刻，尤其是在新时代，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新阶段，邓小平的生态环境保护思想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价值。在当今的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邓小平的思想为新时代的环保事业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启示我们要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推动环保事业的发展。在新时代的环保工作中，科技创新必须发挥核心作用。只有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才能有效解决资源短缺、污染治理等问题，推动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的可持续保护；建立符合新时代要求的环保体制，加强法治建设，确保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制度更加完善，增强环保工作的执行力和约束力。通过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的法治保障，才能为社会经济的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制度支持同时，邓小平也提到，要加强国际合作，借鉴全球范围内的先进经验，联合各国共同应对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通过国际合作，中国能够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推动全球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邓小平的环境保护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继续影响着当今中国的发展方向。它不仅倡导保护生态环境的紧迫性，也强调科学技术的创新作用和国际合作的必要性，为我国以及全球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3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生态文明思想

在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江泽民继承并发展了我党在生态环境方面的思想。他虽然没有直接提出“生态文明”这一概念，但在多次报告和讲话中，他明确强调了“生态”这一关键词，进一步丰富了我党的生态智慧，为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持。第一，江泽民特别强调要统筹人口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提出了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的战略目标。他认为，人口的增长与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之间必须保持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才能确保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和人民的福祉。他指出，真正的可持续发展不仅仅是经济的增长，还要关注环境和资源的保护，通过实际行动来切实维护生态平衡。这一观点体现了江泽民对生态保护与社会发展的高度重视，反映了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必须更加注重环境问题，避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生态环境的代价。第二，江泽民提出，处理好环境、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必须放在可持续发展的层面上来考虑。他明确表示，这不仅是中国未来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而且还是我们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的基础，他明确指出“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环境保护”[7]。这一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突出了生态环境作为社会和谐与经济发展内在联系的关键角色。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环境保护不再是经济建设的附属品，而是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第三，必须将环境建设与生产力的发展紧密结合。在此过程中，他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明确表示科技进步是推动国家发展的核心动力。在重视科学技术创新的同时，他首次明确指出，生产力的发展与生态环境密切相关。他提出，“破坏资源环境就是破坏生产力，保护资源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资源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8]。这一主

张，突破了传统的经济增长与环保对立的思维方式，提出了环保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江泽民的这一理论，为中国在发展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推动了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江泽民的生态思想不仅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了中国智慧。通过对生态环境与生产力的有机结合，江泽民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深刻的生态视角，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与生态保护的有机统一。这些思想至今仍然对我国的环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深远的影响

新世纪、新时期，胡锦涛同志高度重视可持续发展，提出并逐步形成了从自然环境到党代会报告中系统阐述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胡锦涛的“和谐社会”理念与“科学发展观”包含了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文明内涵，强调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性。面对资源约束日益加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等诸多问题，胡锦涛提出，必须始终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思想。这一理念要求我们在发展中坚持“保护优先、节约优先”的原则，强化生态保护，同时要尊重自然的恢复力，允许自然自我修复。胡锦涛进一步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到国家发展的总体布局中，明确将其作为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并行的五位一体战略之一。胡锦涛强调，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重要途径。他提倡大力发展环保产业，推动绿色生产方式的普及，并明确指出，要依靠科学技术来实现资源的综合利用和环境治理，推动经济、环境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在胡锦涛的生态文明思想中，科学技术不仅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也是解决环境问题、促进资源高效利用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胡锦涛同志深刻意识到资源与环境的保护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福祉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基于此，他特别重视科学技术的创新与应用，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科技进步与生态文明的紧密融合。在提出科学发展观时，胡锦涛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即发展不仅要考虑经济效益，更要注重环境保护与社会和谐，其最终目的是促进社会全面、多层次、协调的可持续发展。胡锦涛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提升到科学发展观的理论高度，强调人类发展的最终目标应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并在全社会形成尊重自然、珍惜资源的广泛共识。胡锦涛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也推动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深化与实施。他的生态文明思想为我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角色定位提供了新视角，也为推动国内绿色转型、实现经济与生态双赢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基础。

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标志性、创新性和战略性的重大理论成果。它不仅基于中国悠久的生态文化传统，还深刻回应了当今全球面临的环境危机，明确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方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过程中，他既吸收了中国古代的生态哲学思想，又立足现代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且在全球生态环境背景下做出了深刻思考。此思想充分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全球视野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生态思维。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逐渐形成了完整的生态文明思想体系。2023年7月17至18日，党中央召开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对过去一个时期我们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取得的一系列历史性成就做了全面总结，对接下来一个时期我们接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处理的重大关系做了深刻阐述，对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做了系统部署，明确提出了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全面领导的重大要求。党的二十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结过去，展望未来，进一步阐述了生态文明建设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中的重要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断发展与创新。

4.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吸收和继承了传统生态文化思想

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华夏文明最早就是在先祖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核心理念之一，“万物有灵”，在中华文明探索人与自然关系的诸多学说中具有最为深远的影响。中国传统思想的主要三个流派儒、释、道，都蕴含着极其丰富的生态文明智慧，都具有相似的有机世界观，儒家学说强调天人合一，佛教主张众生平等，道教讲究道法自然。如果把“天”看作整体自然条件，天人和谐的观念早在上古就已经萌生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种各样的思想层出不穷，但是在生态环境问题上，诸子百家的观点却惊人的相似，即敬“天”。尤其是强调天理和人文是对应关系的儒家。经过秦汉，隋唐，宋明的复杂社会演化，中华文明越来越成熟，“天人合一”的思想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了一条贯穿中华文明历史的重要主线，影响着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的方方面面。

近代以来，我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逐渐被席卷全球的资本扩张和工业化浪潮瓦解，“天人合一”的传统生态观念也逐渐开始变得开始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吸收了大量西方国家的自然科学和民主思想后，

“唯技术论”，“唯理论”等错误观点甚嚣尘上。诚然，科学技术极大的增大了社会生产力，人类改造世界的的能力变得前所未有的巨大，有人开始认为“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有人开始过分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工具化思维方式受到资本的推崇和鼓励，包括自然在内的世间万物都被降低为“有用物”。导致这些观点产生的原因是自然科学和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缺少足够的人文主义关怀，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天”与人的对立大过统一，最终人类社会开始与自然发生冲突。二十世纪的五大公害事件，“雾都”伦敦，雾霾现象等等，就是伴随生产力发展而来的生态危机，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今天，我们应该从中得到启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提出，恰恰是对这一历史背景的回音。它不仅继承了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还结合当今全球面临的生态问题，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强调发展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最终达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机统一。

4.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传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重大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国生态文明具体实际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交融的结晶，其在传承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基本原理的根基上实现了创新发展。经典马克思主义所处的时代背景下，尽管未将发展观问题或生态问题列为核心聚焦并集中探究，马克思恩格斯也未曾专门针对生态环境问题著书立说，但他们以高瞻远瞩的洞察力敏锐地捕捉到，伴随生产力的迅猛发展，生态问题必将逐渐凸显并可能趋于严峻，这一前瞻性认知为后世生态文明理念的持续演进奠定了思想基石，也彰显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对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关系思考的深邃性与前瞻性。马克思恩格斯在许多地方都提到环境的破坏与污染，他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会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恩格斯认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应当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应当反对那种把人类和自然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习常过程所作的干预所引起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特别自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越来越有可能学会认识并因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们的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较远的自然后果[9]。”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深刻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创新。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理论中蕴含着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邃洞察，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这一基础上，结合当代中国与世界面临的生态挑战与发展需求，进一步深入剖析人类文明发展规律，深刻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必然趋势，强调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摒弃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推动人类文明朝着绿色、可持续的方向转型。在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精准把握自然界的内在运行法则，认识到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平衡性与动态性，倡导遵循自然规律进行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确保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健康，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有力丰富。从经济规律角度出发，它深刻揭示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并非对立而是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提出绿色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这无疑极大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对经济与生态协同发展规律的认识深度与广度，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极具价值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引领着世界走向更加美好的生态未来。

4.3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炼与扬弃了西方生态文明理论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也广泛吸收了现代西方生态哲学思想与生态科学的内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导致了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正在变得恶劣，一系列现象引起了西方大量学者的关注和反思。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西方生态文明理论在其内容上呈现出单纯德治主义和技术主义解决路径的倾向。持德治主义观点的学者认为，生态环境问题的重点在于个人生活方式的变革，人们需要减少浪费，减少碳排放，避免空气污染和水污染；持技术主义观点的学者认为，生态环境的改善归根到底在于技术革新，配合制定包含奖惩机制的严格的环境制度，在现有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解决生态危机。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则主张“德法兼备”，既不把技术创新、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对立起来，也不将技术创新、经济增长与资本追求利润的可持续发展联系在一起，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是为了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追求，主张建立技术创新、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机统一关系。

在西方生态文明理论中还存在着部分生态中心主义的观点，即将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置于绝对核心地位，弃了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将人类视为唯一价值主体的观念，主张自然生态系统中的所有组成部分，包括生物个体、物种群落以及非生物环境要素，均具有内在价值。这种内在价值并非基于人类的主观评判或功利性需求而

存在，而是自然本身所固有的属性。这种观点过分强调生态系统整体利益，几乎完全不能付诸实践运用，其原因在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与开发。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之不同，它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同时自然也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对象。例如，中国在生态建设中既重视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又强调要满足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活环境的需求，体现了以人为本和尊重自然的有机结合，避免了西方生态中心主义可能导致的忽视人类合理发展需求的问题。

人类所处的存在系统呈现出极为复杂的生态特征，其由社会、经济以及自然这三个关键维度相互交织耦合而成。其中，每个维度均遵循着各自独立运行的内在逻辑与规律，同时又无可避免地承受着来自外部多元因素的作用与限制。唯有在这三个部分彼此契合，达成输入与输出的精准平衡之际，整个复合生态系统方能步入平衡的理想境界，进而维系稳定的状态，并持续推动良性循环的有序运转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提出了意义深远的“生命共同体”理论。他深刻地指出，“我们要认识到，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10]，形象阐述了自然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内在规律。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那么就极易陷入顾此失彼的困境，最终致使生态系统陷入失衡的险境，甚至遭受严重的破坏。

5 结语

自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思想在时代的浪潮中逐步发展与丰富，它深深扎根于中国国情与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土壤，始终将人民利益置于首位，秉持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理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传承与发展，在构建美丽中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打造人民绿色美好家园以及提升人民幸福感等诸多方面，均发挥了中流砥柱的关键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智慧与哲学思想深刻洞察到当代发展与子孙后代福祉的紧密关联，坚决倡导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路径，严禁对子孙后代资源的不当侵占，全力维护代际公平，合理管控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强度与节奏。这一理念的提出，是基于对人类发展历程中生态问题的深刻反思。长期以来，粗放、高耗、高污染且低效的发展模式在全球范围内盛行，中国亦深受其累，生态问题接踵而至，生态危机的乌云逐渐笼罩。在此严峻形势下，唯有确立清晰且系统的生态哲学思想，方能为生态问题的化解提供坚实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根基，从而逐步驱散生态危机的阴霾，铺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可持续发展的康庄大道。生态文明思想的确立，对于中国特色生态伦理与生态文明的塑造具有决定性意义。它促使中国在未来发展的战略抉择中，将生态安全与生态效益纳入核心考量范畴，使绿色可持续发展成为坚定不移的行动指南。生态系统犹如一张错综复杂且相互关联的巨网，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国共产党的生态哲学思想在美丽中国建设进程中，恰似明亮的灯塔，照亮前行的方向，从人民最根本、最切身的利益出发，精心勾勒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宏伟蓝图，并通过不懈的实践与持续的发展，将这一美好愿景逐步转化为现实。展望未来，在中国共产党生态哲学思想的引领下，生态文明建设必将持续释放强大能量。一方面，它将精准对接并充分满足中国人民对高品质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与多元需求。随着时代的进步，人民对于清新的空气、洁净的水源、安全的食品以及优美的生态环境的渴望愈发强烈。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将有力推动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使城市与乡村更加宜居宜业，人民能够在蓝天白云、绿水青山的环抱中畅享生活的美好，在亲近自然、感受生态魅力的过程中收获身心的愉悦与幸福。

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成就也将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卓越的中国方案与中国力量，积极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生态问题已超越国界，成为全人类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中国以自身的实践与智慧，展现出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决心与卓越成效，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功范例。通过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分享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进技术与宝贵经验，中国将携手世界各国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全球性生态难题，引领全球走向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发展新征程。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思想将持续焕发生机与活力，不断丰富与完善自身内涵，与时俱进地适应时代发展的新需求与新挑战。它将进一步强化科技创新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核心驱动作用，大力推动绿色能源、绿色产业、绿色技术的蓬勃发展，加速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良性互动与深度融合。同时，生态文明思想也将深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通过加强生态文明教育、培育绿色文化、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全面提升全体公民的生态文明素养与环保意识，使生态文明理念成为全社会的广泛共识与自觉行动。

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思想作为引领中国走向绿色未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智慧结晶与精神旗帜，不仅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生态基石，更为全球生态安全与人类文明进步书写浓墨重彩的壮丽篇章。在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征程中，我们应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思想的伟大旗帜，砥砺前行，为创造

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的美好家园而不懈努力，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充满生机与希望的美丽星球。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家林业局.毛泽东论林业[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 [2] 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 [3] 《毛泽东文集》第 6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
- [4]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
- [5]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
- [6]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 [7] 《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279
- [8] 《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282
- [9]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10]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 新华网, 2013